

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

——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

王 真

内容提要 评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 必须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不作具体历史分析, 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 或过高评价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 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 不应套用一般原则, 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于这种关系缺乏稳定的基础, 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是亲英美集团, 改善中苏关系出于被迫。国家主权问题并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 这不是因为主权本身不重要, 而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介石看来, 中苏关系中更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 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无法满足时, 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介入成为中国的盟国, 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就失去了应有价值, 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苏关系 是与非 科学态度

孙才顺同志在《如何评判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一文(《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以下简称孙文)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值得商榷, 但又并不具有什么新意的老问题。记得十几年前, 在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时, 就已经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 认为苏联对华政策就是民族利己主义。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中苏友谊的观点。现在孙文复制了这种观点, 并进一步把它推向极端, 认为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从本质上讲只能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严重的民族利

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本质”。^①由此该文断言：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方面。笔者则认为，对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问题的研究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要看能否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就要求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切忌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这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一 关于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评价

孙文认为，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本质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如此结论，未免武断与轻率。

何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并由此而决定事物的一切。轻言苏联对华政策的本质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无异于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对华政策，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探讨本质，总要从现象入手。纵观中国抗战8年，难道能说苏联对华政策一直都是在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吗？显然不能。从抗战初期来看，众所周知，在中国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之际，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世界大国就是苏联。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阐述苏联对外政策时明确宣布：“我们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②此前在1937年8月中苏两国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该约实际上具有互助的功能。从1937—1941年，受命来华的苏联顾问有300多人，志愿飞行员20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此外

① 孙才顺文，《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9、126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9页。

还有为输送援华物资驾机、开车来华者达数千人次。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力动员, 恐怕难以用民族利己主义来解释。特别是苏联飞行员英勇作战、不畏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更加令人敬仰。荣膺中华民国金质奖章的古边科, 当空战中子弹打尽后, 勇敢地用飞机撞击日机。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歼击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 200 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 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难道也是为民族利己主义所驱使吗? 抗战初期, 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财政和物资援助。此间, 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贷款 2.5 亿美元, 年利仅 3%, 这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贷款利率, 英美后来对华贷款利率则在 4% 以上。中国偿付苏联贷款可用农产品和矿产品^①, 如矿产品不足时可扩大农产品比例, 而英美贷款的偿付则必须用锡、钨、锑等战略原料, 而这些战略原料正是中国战时须臾不可或缺的。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火价格一般都低于国际价格。1938 年 6 月, 孙科去法国时, 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谈到他新近从莫斯科争取到一笔 1.6 亿卢布的贷款, “在国际价格上, 这实际上是 4 亿卢布, 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订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 每架飞机价格折合美金仅 3 万元; 装备一个中国师的费

① 到 1945 年中方是否偿还了届时应偿还的贷款, 孙文是用中方向苏方出口钨砂的数量来推断的, 认为富富有余。苏方材料却认为中方仍欠款, 最多一说为约 4000 万美元。参见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 莫斯科 1977 年俄文版, 第 148 页。另据中方材料, 从 1941 年以后, 中方偿债出现积欠问题, 如 1941—1942 年度欠交农产品约美金 500 万元, 只能并入次年度偿还, 加重次年负担, 形成恶性循环。如到 1944 年 7 月 1 日(年度还款截止期), 交货合美金为 6987447.54 元, 约当合同数值二分之一。故中方自己也认为:“至于合同履行情形, 则不能认为满意。”《行政院对外贸易委员会关于偿还苏联贷款的节略》(1944 年 10 月 25 日), 引自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3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01—302 页。

用仅合中国货币 150 万元”。^① 抗战爆发后头 18 个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376 架飞机和 82 辆坦克,各自相当于苏联 1938 年飞机和坦克产量的 6.8% 和 3.6%。要看到,苏联当时也面临一种紧张的国际环境,诚如美国学者加沃评论说:“在苏联匆忙准备战争之际,这些出口相当于一种重大的牺牲。”^② 本文不可能过于详尽地叙述苏联的对华援助,但有一点却可肯定,如果苏联以民族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要付出“重大的牺牲”的援助的。

对于苏联的援助,当时中国方面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把苏联和斯大林看作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1939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庆贺斯大林 60 寿辰时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③ 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正在国际社会游说以争取外援。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在与顾会谈时,表示怀疑苏联是否在尽力帮助中国。顾“告诉他苏联做得并不坏,中国已经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物资援助”。^④ 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孙科顾问吴尚鹰,曾随同孙科去苏联争取援助。他在同人谈起这件事时也说,据他的看法,“苏联领袖们是真挚而诚恳的”。^⑤ 这些情况都从不同侧面说明这一期间苏联对华援助是积极而有效的,对苏联援华政策理应予以肯定。

评价这一期间苏联对华政策,应当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

-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3 分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6 页。
- ② [美]约翰·加沃:《中苏关系 1937—1945》,纽约 1988 年英文版,第 49 页。
- ③ 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8 页。
- ④ 《顾维钧回忆录》第 3 分册,第 15 页。
- ⑤ 前引书,第 171 页。

能把民族利益同民族利己主义混为一谈。苏联援华,无疑是有其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考虑,这就是希望中国能够牵制日本,以避免其与德国、日本两线作战。但这有什么过错呢?是完全正当的。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①援助别人,同时也是为着自己,这实质上就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这也是恩格斯所赞成的保尔·拉法格所提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国际主义决不意味着取消祖国,决不能意味着牺牲祖国。”^②从恩格斯和列宁这些思想可以看出,国际主义、对外援助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不矛盾,是完全可统一起来的。就拿中国来说,也有过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提出的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很明显,这是把对外援助和国家利益紧密统一起来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③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尚在苏联争取援助的周恩来的电报中又说,我们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④在这里,毛泽东把出兵对东方、对中

① 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8页注102。

③ 毛泽东:《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④ 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前引书,第103页。

国、对东北是否有利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就是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而不单单是朝鲜的利益,又有谁能说这是什么民族利己主义?民族利益与民族利己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而在于是否损害他民族的利益。民族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它把本民族利益置于他民族利益之上,牺牲他民族利益来获取本民族利益。从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来看,它虽然强调了援华对苏联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把考虑自身利益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但这一期间并没有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相反,是中国方面得到巨大援助,从而有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特别是这种援助是在当时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见危不救、袖手旁观之际进行的,其意义就更显重大。有人形容这种援助是大旱之际望云霓,实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考虑通过援华抗战来解决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以避免两线作战,是无可非议的,这是把本国利益同中国民族解放利益统一起来的具体表现。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本质无论如何是不能定性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就是蒋介石本人对这一时期苏联援华也是给予肯定的。他说:“当中国抗战初期,苏联首先予我极大之精神及物质之援助,凡我人民莫不铭感。”^①国民党《中央日报》也曾发表社评说:“苏联在我们从事抗战的初期,就已给了我们许多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最显著的派了空军来助战……我们实应铭诸心版,永不遗忘。”^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方面在哈尔滨、佳木斯、长春、沈阳、大连、旅顺等30个城市和地区建有苏联红军纪念碑、塔或雕塑,在满洲里、赤峰、齐齐哈尔、四平、沈

①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45年8月9日),《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1933—1945》,第658页。

② 《苏联对日作战》,《中央日报》1945年8月10日。

阳、锦州、大连、旅顺等近 50 个城市和地区建有苏联红军墓地。^①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红军为中国抗日战争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永恒的怀念。如果按照孙文的逻辑,苏联援助也好、出兵也好,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是民族利己主义的,那么中国人民又何必去纪念这些为民族私利而阵亡的苏军将士呢?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中有没有民族利己主义的一面?当然有。这主要表现在抗日战争后期,即 1945 年 2 月关于远东和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也还有其他方面)。斯大林以恢复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作为出兵中国的条件,并迫使中国方面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这种做法确实严重损害了中国权益。关于这一点,笔者早在《抗战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动荡中的同盟》等论文和著作中阐述过,并且这也是中国史学界早就达成的共识。孙文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陈年老账翻了出来,特别是象斯大林关于出兵远东理由的那段话,不知被论者引用多少次了,还要再数落一遍,实在大可不必。但孙文现在仅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以此对苏联援华政策做出本质性的结论,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

评价抗战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必须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加以具体分析。即使是在苏联民族利己主义表现较为严重的抗日战争后期,对其政策也不能全盘否定。苏联出兵的出发点有问题,攫取在华权益确不应该,但它对日宣战毕竟促进了抗战的胜利。对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作具体分析,就是既要看到其前期,也要看到其后期;既要看到其动机,也要看到其效果;既要看到其国家性质,也要看到其实际表现。毛泽东在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时,就是采取具体分

^① 参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0 页。

析的方法,得出两头好、中间差的结论。^①综观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应说有好有差,但如将其本质定性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无论从苏联当时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是从具体的历史史实来看,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利益,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苏联推行的这种外交政策,包含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但不应全盘否定,尤其不能以偏概全,对其政策本质做出简单的结论。

二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苏政策

孙文认为,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苏政策的标准应当是国家利益标准,意识形态不具有决定性因素。抽象地、笼统地说,这句话并不错。但是我们分析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而是要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懂得原则是怎么规定的,更要看在实际上是怎样执行的。

孙文在例举了影响中苏关系的几件大事,诸如中东路事件、锡矿协定、苏日中立条约、中德关系、苏联对日参战等,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国民党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和处理的,是以国家主权为重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尽然。

关于中东路事件,史学界评论不一。事件起因虽复杂,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事件是由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直接挑起的,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为什么要支持挑起这一事件?象孙文所说,是“为了收复和维护国家主权”吗?这有些高抬他、美化他了。笔

^①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者认为,分析中东路事件,不能就事件论事件。中东路的权益问题悬而未决,这是一个因素;蒋介石要反共排苏,又是一个因素。这两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要利用前一个因素来实现后一个因素。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积极推行反苏方针,但他绝不只是因为中东路权益问题没有解决才反苏。蒋反苏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反苏反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蒋介石把苏联看作是中共的后台,认为不排苏,中共的“内乱”就无法平定。就在南京政权建立后不久,即1927年12月10日,蒋介石便声称:“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断交……现在急需要将俄国领事馆以及商业机关一律关闭。这种机关不关闭,共产党的扰乱是不会停止的。”^① 据此议,1927年1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即通过《对苏绝交决议》。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又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② 汉口、上海、广州等地的苏领馆很快被封,人员被逐,并以参与广州起义为由杀害了5名广州苏领馆人员。这是蒋介石恶化中苏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1928年12月,张学良改旗易帜后遂派军队查抄了哈尔滨苏总领馆,蒋即表示支持。1929年7月11日,张学良应蒋之召抵达北平。蒋鼓励其坚决清除东北的“共产主义势力”。^③ 这是张后来挑起中东路事件的一个动因。在中东路冲突中,中方损失惨重,后在美、英、法等国调停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其条件则对苏方有利。蒋介石并没有通过中东路事件达到其目的,反而使自己陷入

①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 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③ 《中国外交史 1911—1949》,第209页。

政治上、外交上的被动。时任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就此指出：“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尤以国民政府之声誉扫地矣！”^① 蒋介石为何落得个“辱国丧权，莫此为甚”的结局，首先就是因为他对苏政策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并非真正为国家主权利益计，而是为了反共排苏。如果真是为国家主权着想，可以与苏谈判，何须“挑衅”？如果真是为民族利益考虑，应当坚持立场，又为什么要“投降”？这只能从蒋的不纯正的动机中去解释。

新疆问题是影响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根导火索。那么，点燃这根导火索的究竟是蒋介石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引发与苏联的矛盾，还是蒋介石支持盛世才反苏反共而恶化了两国关系呢？请看事实。新疆问题严重影响到中苏两国关系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是因为在盛世才、蒋介石这些人看来，苏联靠不住了，反它一下又如何！由此，盛世才制造了一系列排苏反共事件。诸如，1942年3月19日暗杀了思想左倾的盛世骥却嫁祸于苏方；9月17日悍然逮捕在新疆帮助工作的100多名中共干部；1942年底要求撤走驻哈密地区的苏军红八团；1943年1月将软禁的中共人员全部投入监狱；是年9月又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名中共领导干部杀害；从1942年上半年起在新疆地区开始迫害和驱逐苏联侨民，等等。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在1944年9月5日备忘录中就新疆问题评论说：“盛从1942年起就故意执行一种刺激俄国人政策。”^② 对盛世才恶化中苏关系的这些行径，蒋介石不仅不予制止，反而大加鼓

① 《蒋作宾日记》1929年12月28日。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② 〔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4年中国卷，华盛顿1967年英文版，第810页。

励和支持。他先后派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等军政要员去新疆商谈排苏方案,甚至让宋美龄亲去新疆抚慰盛世才,并封盛为新疆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八大要职。蒋如此厚待盛,显然是出于盛的转变立场、反苏反共。蒋如果真从国家利益考虑,是不会这样做的。试想,恶化了中苏关系,你还想不想要苏援?破裂了国共关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还是不利?蒋对盛的支持只能表明蒋此时并没有把事关抗日大局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是固执其一党私利。何况苏方曾向蒋披露了盛世才于1941年1月曾建议使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事^①,蒋对这样一个背叛民族利益的人不但既往不咎,反而赞许有加,究竟是出于国家利益呢?还是出于一己党派私利呢?立场公正者自会有公论。笔者在《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一文中引用过程天放关于蒋介石对盛世才态度的一段话:“南京政府很了解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但容忍了他,因为害怕把盛的职务解除,他将公开叛变,并且南京政府也没力量来镇压他,盛的手既可与日本又可与共产党挽起来。后来,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重庆的军事供应经过新疆,国民党政府很少既想得罪苏联又得罪盛。”^② 引用这段话,意在说明国民党对盛的权谋,以及在对苏政策中确有比国家主权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盛在政治立场上的左与右都会造成对南京政府的不利。孙文竟把这段话解释成:“苏联通过新疆援助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超过了‘新疆问题’本身的意义,这才是蒋介石采取容忍态度的真正原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三),台北1981年版,第435—436页。

② 《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58页。

因。”^① 孙文这里首先搞错的就是一个时间概念。程天放所说的南京政府的“容忍”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还没有缔结，苏联也还没有实行对华援助，怎么能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接受了苏援，但盛世才后因反苏即成为中苏关系的障碍，要理顺中苏关系，继续接受苏援，理应对苏方“很不满意”^② 的盛予以处理，蒋却迟迟不肯这样做。直至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告诉蒋：“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③ 才触动蒋调整中苏关系。同年8月13日，生性多疑的盛世才竟然对驻新国民党人员大逮捕，这又触怒了蒋。“朱绍良向蒋介石报告以后，蒋介石决定把盛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盛也感到压力很大，再待下去已不可能，只得表示接受”。^④ 8月29日，中央社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样，从1942上半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事端，到1944年8月29日将盛撤换，历时2年有余，对中苏睦邻关系造成极大损害，这是在考虑国家利益，考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吗？而且，蒋当时也并非绝对没力量来对付盛。1941年秋季以后，蒋已经争取了青海的马步芳，打开了国民党军进入新疆的通道。“李铁军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随即由酒泉移驻哈密，预七师不久也进入乌鲁木齐”。^⑤ 1943年前后，胡宗南的军队驻在河西走廊，对付盛世才“有实力为后

①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2页。

②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有新谈话记录》（1942年7月9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412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④ 李帆群：《1944盛世才在新疆的最后一次大逮捕》，《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84页。

⑤ 曾小鲁：《吴忠信主政新疆纪略》，同上书，第289页。

盾”。^①况且,按照当时的新苏关系,如果蒋真要动盛,苏联必予配合。这种形势与中日战争爆发前、新苏关系融洽时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蒋动不了盛,而主要是蒋不想动。蒋把盛世才“转向”看作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②由此,蒋才与盛沆瀣一气,排苏反共,中苏关系恶化也就势所必然。

当然,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确犯有严重错误,如吞并唐努乌梁海、逼签锡矿条约等,笔者也早已论及这一点,指出这是苏联对外政策中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③这里要搞清一个问题是,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错误在当时是否足以造成两国关系恶化?是否因为蒋介石要维护国家主权才开罪苏联的?唐努乌梁海问题由来已久,沙俄时代就曾宣布其为保护国。1920年12月12日,苏俄宣布其为杜芬人民共和国;1943年被列为苏联自治邦;1945年苏联大选时被列为第299选区;1948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其并入苏联。^④在如此之长时期内,蒋介石有过什么表示吗?194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在呈蒋介石的报告中说:“查唐努图温共和国,原为我唐努乌梁海之西部,向非库伦外蒙政府所属,尤非苏联领土,前此苏联予以占领,我迄无行动,此际在外交上似应明确表示,保留对苏联提出交涉之权利,所见当否?”蒋批示:“先交外交部核议,并饬国防部第二厅将民三、民九、民十五、民三十二各年苏方对唐努进行侵略时我方所取

① 孙越崎:《抗战期间两次去新疆纪略》,《文史资料选集》第8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② 蒋介石1942年12月31日日记,转引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598页。

③ 参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61—62页。

④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国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台北1981年版,第718页。

对策详报。”^① 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表示,且长期以来“迄无行动”,采取的是静观和沉默的态度,何以去激化同苏联的矛盾,进而恶化两国关系呢?锡矿条约是1940年11月26日由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巴库林和盛世才秘密签订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该约签订不久蒋便获悉消息^②,但他未动声色,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直到盛世才与苏联反目后,蒋对新疆主权问题仍持平和态度。1942年7月16日,蒋在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说:“今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逕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尤其当此贵我两国共同反抗侵略作战之时,两国一切交涉,更应守此精神,积极敦睦盟谊。”^③ 可见,排苏与主权在蒋介石那里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新疆主权问题并非是使两国关系骤然恶化的根本原因。然而,两国关系此间恶化又是明显的事实,不从蒋支持盛排苏反共的行径中去解释,又能作何解释呢?此外,也有迹象表明,蒋并不是把对苏关系与新疆主权完全联系在一起。1942年7月13日,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收复新疆主权方略》,在其“实施要领”中写道:“设法使英、美基督教入新疆传教,使苏联行动多所瞻顾,稍加敛迹。”^④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透露了这一情况。1942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傅秉常在与高斯会谈时说,在新疆开发中,俄国人的利益太重了,可以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请到新疆

①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国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台北1981年版,第716页。

② 参见《中苏关系1937—1945》,第162页。

③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记录》,《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1933—1945》,第417页。

④ 《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与盛世才离新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1933—1945》,第416页。

来。高斯在备忘录中就此加注:“大概是为了抵销俄国势力。”^①前门要拒狼,后门竟引虎,蒋的这一排苏“要领”又怎么能用维护国家主权来辩解呢?如果认为蒋完全是从国家利益考虑而排苏,那就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也着实美化了蒋。

苏日中立条约问题,笔者以往曾撰文明确指出:“苏联为了远东边境安全和应付紧张局势,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苏日中立条约问题同样反映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国民党抓住这一点抨击苏联,不无道理”,肯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条约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从影响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因素来看,笔者是把它作为苏联因素来分析的,就可看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观。而孙文却对这个问题加以演绎,说什么在条约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蒋未采取分裂关系的行动是不以国家主权为重”。^②这是对笔者原意的曲解。笔者的意思是,中立条约确实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但蒋介石并未采取破裂两国关系的行动,说明即使是国家主权这样的重大问题,当时也未构成恶化中苏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孙文对笔者的判断作出一个逆命题判断,即未构成恶化(“未采取破裂”)两国关系也是因国家主权的因素(“以国家主权为重”),这是违反形式逻辑公理的。举个例子,历史研究应当是科学研究,逆命题则为科学研究应当是历史研究,这显然是不成立的。从一个命题的逆命题推导出来的结论往往要出错,用这种方法来反驳对方观点是不科学的。从实际上看,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基本上也是正常发展的。这正如蒋本人所说:“自十三日条约订立以来,事实上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

①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谈话备忘录》,《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 1933—1945》,第 420 页。

② 《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23 页。

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① 孙文却硬要把蒋未采取分裂行动同国家主权问题联系起来,强调蒋的主权观和国家利益观,似乎蒋不论是维系关系也好,还是分裂关系也好,都是以国家主权为重的。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线性思维,不利于对复杂的历史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应当说,蒋在其对苏关系中,有考虑国家主权的因素,讲过一些这方面的话,也有过某些举措,但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以国家主权为重的”。就苏日中立条约而言,蒋介石虽然对苏、日就满蒙互划势力范围表示不满,但在其心目中并没有将此事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是认为条约“于我国固毫无损伤”,因为此时“英美之联防已成”,中国“对于抗战资料已作最艰苦时期之准备,即使国际路线完全封锁,外来接济皆被切断,亦足以支持三年以上”。^② 因此,条约问题、满蒙问题对中国无妨大局,不值得与苏联闹翻。这是蒋介石从对抗战影响的角度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应当说有值得肯定之点,但这与国家主权不完全是一个问题。这里说的国家主权是领土主权。从上述蒋的态度可看出,他并没有把领土主权问题视为中苏关系的一种主要障碍,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没有把苏日中立条约看作恶化中苏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的道理。

中德关系是影响战时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这一点应当承认。这种影响就是苏德战争爆发之际,蒋介石及某些国民党要员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如据时任驻苏大使邵力子回忆,当获苏德要开战消息时,“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皆喜形于色”。邵力子后分析说:“依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愿望,最好是德、日一齐攻苏,以达其

① 《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 1933—1945》,第 376 页。

② 《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同上书,第 377、378 页。

反苏反共之宿愿,并坐收渔人之利。”^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当时甚至称:德国必胜,日本亦必胜,对德绝交实属错误。国民党一些亲德人士亦扬言:中国要与英、美绝交,废止滇缅路修筑协定,以人力物力供应德、日两国。^② 当人落难之际,听到这种话,刺不刺激?这与国家于个人恐怕都会有同感。当然,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并没去践行这些“解恨”的话,但其上述表现对中苏关系肯定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孙文在论述中苏关系时,竟对此不愿谈及,而大讲蒋是如何“忧虑”苏德战争的,这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在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上,孙文的观点更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孙文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也无可非议”。其理由是,此时“两大阵营划分已近显然”,苏联参战“符合反法西斯大局及各国利益”。^③ 这种论断完全是一种原则的抽象,缺乏从实际出发的具体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1941年,苏联面临的是何种形势?德军重兵压境,苏联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而从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两国实力比较看,德国又略占上风。1941年6月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陆海空三军兵力达460万人。^④ 德军北线围攻列宁格勒,中线进攻莫斯科,南线指向斯大林格勒,苏联全线吃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并由于猝不及防而损失惨重。在如此险恶形势下要求苏联再对日参战,实在是强人所难。孙文称,评价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要着眼于国家利益,那么请问,评价此时

① 邵力子:《出使苏联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② 《何应钦认敌为友》,《解放日报》1941年7月26日。

③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5、126页。

④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页。

苏联对华政策,允不允许人家考虑一下国家利益呢?孙文认为,苏联参战才是“符合反法西斯大局及各国利益”,那么不参战就是不符合这种利益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①德国法西斯是轴心国集团中力量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则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在苏德战争形势严峻、苏联危在旦夕的情形下,苏联集中力量抗击德国侵略,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所讲的那个道理。还要看到,蒋介石虽然留在了抗日阵营,但其抗战并不是坚决的,并没放弃对日谋和活动。除通过陶德曼调停这些为人熟知的事之外,蒋介石在1938年7、8月间还曾派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兄弟萧振瀛与日本特务秘商议和条件及谈判地点。^②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又令航空委员会军令厅将一封对日妥协和出卖中国主权的密信空投到当时在南京慰劳日军的日本秩父宫亲王。信中说:“如果日本停止在关内的军事行动,可以考虑把东三省全部割让。”^③蒋如此首鼠两端,妥协动摇,甚至不惜以国家领土主权作交易,又如何让别人助你抗战?1938年8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

② 参见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67页。

③ 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1页。

月7日,正在苏联争取援助的孙科电告蒋,苏联现不愿对日参战的理由之一,即“虑我决心不足,战不力,彼若急参战,我惑中途变计”。^①道理很显然,自己抗日不积极,却硬要拉别人来打日本,就有转嫁抗日重担之嫌。这也是研究苏联参战问题应当看到的一个因素。

孙文还认为,苏联最终是以攫取中国领土为条件才对日参战的,因此也就更有理由来指责苏联。^②不错,苏联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历史学者老早就指出的问题。但要看到,苏联攫取中国权益是它抗战后期出兵的一个重要考虑,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如前所述,当时未参战主要是苏德战争形势不允许,而非中国权益问题。如果能够实事求是看待这一点,就更有理由指责蒋介石在强人所难了。

三 关于抗战时期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孙文在抗战时期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上与笔者意见相反,认为根本原因在苏联方面,而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孙文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国家利益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进而推论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维护国家主权才与苏联关系恶化的,故主要责任在苏联方面。

笔者认为,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按照孙文的逻辑,意识形态不属于国家利益,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三),第408页。

②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6页。

其实这恰恰错了,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性利益,它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把美国国家利益归结为四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①价值观念显然就是意识形态利益,它是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意识形态利益之所以构成国家利益的一个主要内容,就在于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也使国家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之一,集中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性,是不同社会制度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意识形态利益作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去认识和处理它,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意识形态利益排除在国家利益之外。孙文认为笔者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分析用的是意识形态标准而不是国家利益标准,就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之缘故。

即使按照孙文的逻辑,只有国家主权和安全才是国家利益,笔者也不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国民党的对苏政策。比如,笔者指出:“至于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逼签锡矿条约协定和在苏日中立条约中侵犯了中国主权的问题,当然也是破裂关系的因素,国民政府为此提出抗议是有道理的。”^②这就是从国家主权角度对国民党处理中苏关系的一种肯定。又如,笔者写道,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时,要苏联以后凡关新疆之事与中央政府交涉,“言辞中虽含有对盛世才庇护之意,却也明显地强调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③这也主要是从国家主权角度来评论蒋的。再

① 参见高金钊:《国际战略学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页。

② 《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58页。

③ 引文同上,第62页。

如,笔者指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斯大林只汲取了列宁的灵活性,即善于妥协,而违背了列宁的原则性,即不损害第三者利益。因而这必然造成同第三者的矛盾。国民党抓住这一点抨击苏联,不无道理。”^① 这同样是从国家主权角度肯定国民党政府而否定苏联的错误做法的。孙文说什么笔者评论苏联是国家利益标准,评论国民党则用意识形态标准,如此不顾事实,令人深为遗憾。

孙文认为评论蒋介石国民党的对苏政策应当用所谓国家利益(不含意识形态因素在内)标准,而不应用意识形态标准。这种观点完全是主观上的一相情愿。我们且不说意识形态利益也属国家利益,就从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来看,它淡化了意识形态、超越了意识形态吗?全然没有。抗战期间,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但蒋介石国民党却在抗战期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欲置中共于死地而后快。在对苏关系上蒋介石国民党也掺入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中苏复交谈判时,蒋介石政府曾提出通过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期苏联驻华代表停止参与中共活动。但苏联方面坚持这个问题在复交后再讨论,结果未被蒋接受。^② 讨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要求蒋停止“剿共”,蒋却认为这是苏联在支持中共而要拆他的台,把改善中苏关系“看作是加强中共地位和中国‘苏化’的一种威胁”。^③ 在该条约交涉中,蒋还坚持“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④ 蒋在1938年元旦日记中

① 《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63页。

②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第183页。

③ A. M. 列多夫斯基:《苏联与中国(1937—1945)——一位苏联外交官的回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第22页。

④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80年版,第73页。

写道：“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① 俄何以为“患”？“患”何以又“隐”？就“隐”在苏联支持了中共这个蒋的“心腹之患”。皖南事变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会见蒋，劝其不要再反共，并暗示其这样可能要影响到苏联的援助。蒋却满不在乎，自称：“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② 外援可以不要，“内患”却不能不除，这不分明是意识形态标准吗？所以，评价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要不要用意识形态利益标准，应当取决于蒋介石国民党实际上是不是在推行意识形态利益标准，而不应当取决于评判者个人的主观愿望。

在分析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这样一个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国家利益时，我们切不可忘记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意识形态利益正是集中而鲜明地反映了这种阶级利益。当然，国家利益不仅具有阶级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这种民族性国家利益是指代表全民族或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安全、领土主权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蒋介石国民党留在了抗日阵营中，进行了抗战，应当说这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民族性。但就国家利益的政治倾向性来说，则是由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决定的，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这也就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必然要反映出这种本质属性。至于民族利益，它往往与阶级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国难当头之际，阶级利益通常以民族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造成了我们在评价国家利益时比较容易看到其民族性的一面，而忽略其阶级性的一面。而有些反动政客也善于用所谓民族利益来掩盖其反动阶级本质。象对盛世才这种人，新疆爱国老人包尔

①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00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汉就揭露说:“盛世才在公开投靠蒋介石后, 时常以他提出过的‘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而自我吹嘘……这个口号后来竟成了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护身符!”^① 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的对苏政策就具有这种复杂性, 需要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注意不要被“护身符”遮住了视线。

孙文认为:“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总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利益”, “因此, 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是与非的标准只能是国家利益和主权”。^② 这说的也是一般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出发点应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不妨看看它在对外政策中是否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沦陷, 蒋介石不抵抗是事实吧? 不仅如此, 他竟大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把“剿共”作为重点, 这叫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利益吗? 1935年华北事变后, 寇深祸急,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仍举棋不定, 反而屡屡进行所谓中日交涉, 而交涉的“中心是共同防共问题”^③, 这也叫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利益吗? 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明显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蒋介石不照样在美国的压力下去吞下这颗难咽的苦果吗? 这也能用最大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利益来解释吗? 1946年的中美商约及其有关协定, 中国在权益上肯定是受影响的, 蒋介石却与美国照订不误, 这还是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民族利益吗? 因此, 套用一般原则来评价蒋介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是不适用的。

① 包尔汉:《盛世才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②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1页。

③ 《蒋廷黻同斯多蒙涅可夫(斯多莫尼亚科夫)谈话记录》(1936年12月3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24—25页。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家主权的原理解释,而应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来看,是把苏联与日本等量齐观,认为两国都“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它们“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① 蒋甚至认为“俄患”甚于“倭患”。他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② 蒋在这里没有把苏联与日本相区别,实质上是把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相区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有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但把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与十月革命前的沙俄相提并论,显然有一种阶级偏见。反过来,蒋认为屁股应坐在西方。他后来说:“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存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决心,认为中国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关系。”^③ 所谓“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这些西方国家。蒋既然奉行亲英、美的外交方针,对苏联抱有戒心,在对苏关系上就必然呈现一种动荡。这是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病根。从1932年中苏复交到1937年两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与苏联的关系都是处于这种动荡之中。最近日本学者也撰文指出这一问题。1935年末,日本方面在《新疆省实况与中苏关系》的报告中说:“南京政府依然地在搞二重政策,即:一边表明防止赤化和经济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②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1985年版,第9页。转引自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页。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30页。

提携而谋中日妥协, 一边联合莫斯科而图阻止日本侵略。”^① 新近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 1935 年陈立夫访苏之所以最终未成, 与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 坚决反对与苏复交者)向日方告密有关。^② 当上海日系报纸报道陈访苏消息后, 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刻“辟谣”。这样做, 无非是怕联系苏联而得罪日本。直至卢沟桥事变后, 蒋介石才迫于形势、迫于舆论压力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与其建立了同盟关系。对于蒋介石被迫与苏联改善关系, 外交家顾维钧也看得很明白。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苏关系在 1927 年由于中国方面报复苏联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而遽然断绝。苏联一直想恢复关系, 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总是拒绝。直到日本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加, 而国联在大国的把持下显然不愿对日本采取果断行动, 这才迫使国民党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③ 显而易见, 中苏同盟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蒋要苏联军火, 要苏联出兵, 可以说这是国家利益所使, 但这对蒋来说也仅是权宜之计。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军援逐步减少, 要苏联出兵也落了空, 加之太平洋战争后美、英援助的大量到来, 这就使原本脆弱的中苏关系显得更加动荡, 蒋的亲英、美立场也就更加明显。苏联方面当时就觉得蒋有些“势力眼”: 现在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顾维钧对此评论是:“此话不假。”^④ 笔者曾指

① 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党的文献》2001 年第 1 期,第 90 页。

② 参见《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党的文献》2001 年第 1 期,第 90—92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2 分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8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分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30 页。

出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对苏政策的不稳定性,主要就是指这种脆弱的基础和蒋亲美而排苏的基本立场。孙文认为,笔者这是从意识形态而非从国家利益来考虑的。即使按照孙文对国家利益内涵的理解,其说法也是不对的。蒋此时疏苏而亲美,正是一种在国家利益获取方式上的转换,由依赖苏援转换为依靠英、美外援。通过这种转换,蒋进一步降低了中苏关系在其战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由此,1942年发生新疆事件时,蒋也才可能积极支持盛世才。从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析中可看到,基础不牢是一个主要因素;基础不牢之主要原因又主要在于蒋对苏联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和立场。因此,一旦有诱因,关系破裂则势所难免。

国家主权问题对中苏关系确有影响,但具体到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根本性的。中苏关系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存在,如1935年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就损害到中国的主权,造成两国关系的一层隔阂,但在后来的中苏结盟谈判中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中日关系、国共关系上。抗战期间唐努乌梁海、锡矿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等问题也都损害到中国主权,中国方面作出了某些抗议,苏联方面却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而且在此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蒋介石仍积极要求斯大林出兵。抗战后期雅尔塔协定损害中国主权更严重,蒋介石也照样通过中苏谈判去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什么国家主权问题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呢?不是主权本身不重要,而是蒋介石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看来,中苏关系中更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无法满足时,中苏关系对蒋也就失去了价值,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早已成为历史,其是非曲直需要后人公

正客观地分析和评论, 这就必须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 而不能任意褒贬。为此, 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历史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使历史研究的结论能够反映历史活动的本质。

(作者王真, 1949年生,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2002年度日本各版中学校历史教科书预订数率

发行者名	2002年度 需要数	2002年度 占有率	2001年度 需要数	2001年度 占有率
东京书籍	676434册	51.2%	556443册	40.4%
大阪书籍	185372册	14.0%	258939册	18.8%
教育出版	161215册	13.0%	247920册	18.0%
帝国书院	144215册	10.9%	26169册	1.9%
日本书籍	77718册	5.9%	188695册	13.7%
清水书院	33346册	2.5%	53716册	3.9%
日本文教出版	30968册	2.3%	45452册	3.3%
扶桑社	521册	0.039%		
合计	1320107册		1377334册	

(据2001年9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资料)